

唐代仕女是当时购买鲜花的主要群体,她们喜欢用芍药花装扮秀发。(图为周昉绘制的《簪花仕女图》局部)



花市 买得一枝春欲放

“日赏繁花夜观灯”，正月十五快到了,各地的花灯、花市都彰显着新春的喜庆。花市,这个人们如今买花最常去的场所,从南北朝起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。

墟集初闻卖花声

花市的历史可追溯至晋代“花朝节”的流风余韵。花朝节是为了庆祝百花生日而设立的岁时节庆,以春日踏青赏花为核心活动,六朝时期初步发轫,唐代正式以农历二月十五为“花朝”。是日,士女(指青年男女或民众)郊游玩春、扑蝶为戏,宫廷、民间皆以赏花为乐事。花朝节的兴起,加之家居赏花的需求,刺激了当时花卉的栽培。长安、洛阳等地出现了专门销售花卉的“花户”,不过此时并未形成固定的市场规模,花卉交易多呈小型、流动的状态。

真正成规模的花市,最早出现于唐代时的广州。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,爱花的广州人就因地制宜,遍植豆蔻花、鹤草、山姜花、兰蕙、水莲、桂、朱槿、刺桐等南国花木,又互通有无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出售花卉的墟集(古老的集市形式)。

唐玄宗在位时,广州专门艺花(种花、插花、赏花等)、卖花的人数已颇为可观。官方在花地河河口设立了大通港,本土的花卉通过大通港远销至欧洲;不

田。广州内外四野芳香,卉木交长,“花田一片光如雪”“相逢尽半是花农”,这些诗句就是欣欣向荣的唐代广州花业的写照。

当时的花卉交易网也已形成。名相张九龄《春江晚景》诗中有“薄暮津亭下,余花满客船”,写的就是当年广州古芝兰湖卖花船的情景。《北户录》有“山花燕脂……正月开花,土人采含苞者卖之”的记载,唐末刘恂的《岭表录异》则有“朱槿花……俚女亦采而鬻(音yù,意思为出售),一钱售数十朵”之录。可见广州此时不仅有固定的花市,更有流动的卖花船穿梭于水网,街头巷尾亦不乏担花叫卖的小贩,形成了交易网络。

与此同时,在“牡丹甲天下”的神都洛阳,兴许是“武则天醉酒焚牡丹”的传说过于出名,令洛阳的花市也名扬海内。每年四月牡丹绽放之际,就是洛阳花市盛大举办之期。牡丹的盛开吸引民众前来花市游赏,白居易的《买花》一诗生动描绘了当时的盛况:“帝城春欲暮,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,相随买花去。”那时被竞相购买的富丽牡丹,并不以品种的贵贱作价,而是根据花枝的数量来定价。一丛深色的牡丹竟能换得二十五匹锦绸,这足以证明牡丹花市在当时的人气有多旺。

元夜花市灯如昼

在宋代,广州几大花市出售的花,皆以秀雅绝丽的素馨花为主。“花市在广州七门,所卖止素馨,无别花,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。”说起素馨花的来历,还有个凄美的传说。五代十国时期,南汉王刘鋹(音chǎng)有位宠姬,名唤素馨。她本是广州珠江南岸庄头村的种花女,酷爱波斯名花耶悉茗。入宫后,她时常带领宫女们种花摘花,装扮宫廷。刘鋹为投素馨所好,下令御花园里都种上耶悉茗。后来,宋朝大军南征,准备平灭南汉。素馨热爱和平,爱惜花草,不忍见两广百姓受刀兵之祸,劝得刘鋹投降,使广州免于兵燹(音xiǎn,指的是因战乱而遭受焚烧破坏的灾祸)。素馨去世后,人们为了纪念她,将耶悉茗改名为素馨花。她的老家庄头村成了专门种素馨花的花田,庄头村人“一生衣食素馨花”。广州另一别称“花城”即由此而来。

作为宋代的政治文化中心,汴京花市的繁华也是拔头筹的。北宋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着:“万花烂漫,牡丹芍药,棠梨香木,种种上市,卖花者以

马头竹篮铺开,歌叫之声,清奇可听。”可见彼时的汴京,卖花、赏花的集市已十分兴旺。

汴京的花市设在寿安山下的寿安坊,向来腊月十五灯市先开,花市随之。《邵氏闻见录》中有对当时人们赏花、购花、游花市的情景描写:“岁正月梅已花……抵暮游花市,以筠笼卖花,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。”在元宵花盛放之际,人们携酒肴来到花圃,面对群芳,纵情饮酒放歌,欢呼玩赏。到了傍晚,花农们用竹笼盛着鲜花来到花市叫卖,卖花买花的人流熙熙攘攘,“花市东风卷笑声”,处处喜气洋洋,春光满眼。尤其是在正月十五元宵之夜,灯火妍花交相辉映,盛大的景象屡屡被文人写入诗词中。文彦博写道:“去年春夜游花市,今日重来事宛然。列肆千灯争闪烁,长廊万蕊斗鲜妍。”欧阳修更据此写出千古名句: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

花市的盛况,连新婚不久的才女李清照,在游赏后也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:“卖花担上,买得一枝春欲放。”李清照鬓角上那枝鲜花的芳香,从宋代的花市中飘来,落在了千年后的纸页之上。宋代诗花美学至今依旧韵味悠长,让人沉醉其中,遐想连篇。

南宋时,随着迁都临安(今杭州),花市的盛况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。江南的湿冷,挡不住人们去水乡的巷弄里寻找春天的热情。临安风景如画,四季百花争妍,赏花习俗也非常兴盛。新的城市结构打破了唐代的坊市界限,商业活动不再受空间限制,于是日常消费鲜花的风气彻底深入到了每一户人家,家家户户都插花、簪花、赏花。从文人的案头、千金闺阁到僧侣的禅房,无不遍插千姿百态的花朵。

由于南宋社会对鲜花需求极大,给花卉贸易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,从而也带动了临安鲜花贸易的繁荣。据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所记,“城内外家家供养,都插菖蒲、石榴、蜀葵花、栀子花之类,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。”须知南宋一万贯钱,约等于如今的300万元人民币。

交易额如此之巨,可见临安的花市有多么发达。《武林旧事》记其“罗列春芳,珍奇百出”,临安已俨然是花团锦簇的大都会。尤其是三月暮春,正是鲜花盛开时节,也是鲜花生意最旺盛之时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,歌叫于市,买者纷然。”

南宋时期的广州花市也已经非常成熟,不仅售卖鲜花,还出现了花苗、花器、插花工具等配套商品,形成了完整的花卉交易产业链。而且,整个花市开始与民俗节庆深度融合,推动了应季花市的兴盛,最终演变成今日人们所熟知的、充

满浓郁年味的春节花市。

百户千家花如锦

明清之际,花市的规模达到了新的高峰。明代的苏州,正月里玄妙观花市最是热闹。道士们在观前摆花摊,卖的是本地培育的“虎丘海棠”“天平梅”,还有杭州运来的“西溪兰”。文人墨客爱逛花市,唐伯虎曾画《岁朝图》,画里有他从花市购得的瓶插牡丹、案头佛手。平凡的日子在花陪伴下也能过成诗。

明代中叶,气候温润,万商云集的珠江三角洲崛起为全国花卉产区。广州河南二十乡多半种花为业,花农拂晓摇橹,把一船船素馨、茉莉、瑞香等,经花渡头运入城,在藩署前设摊摆卖。七座城门就是七座花市,每天仅素馨一项便卖断数百担,其他花卉也是琳琅满目。

清末,广州固定在春节前夕大规模举办小年夜至除夕通宵达旦的“元宵花市”。四季不断的花市,到此时达到一年的顶峰。“年卅晚,行花街,迎春花放满街排,朵朵红花鲜,朵朵黄花大,千朵万朵睇唔晒(‘睇唔晒’为粤语看不完的意思)……”从此,广州人有了个习惯:行过花街才算过年。桃花、金橘、水仙并称“元宵三件头”,至今不替。“行花街”成了广府文化、岭南文化的标志性民俗活动,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

舍间迎回一室馨

北京人爱花,从皇宫王府、官宦之家到小户人家皆然,所以鲜花的需求量极大,而丰台花农提供的鲜花也极多。北方寒冷,花担上的春意更显珍贵。所以一进入腊月,花市集一个接一个,称“连集”。崇文门、朝阳门外,腊月二十八“花市口”开大连集,用暖房培育的冬令鲜花,被花农放在纸糊的篓子里,担到花市集上来卖。花担以及果担、玻璃担排成三里长龙,有人买蝴蝶梅、有人买水仙、有人买素馨……各取所需,人人欢悦。

由于气候的原因,北京的迎春花市不像南方花市那般铺天盖地的绚烂,却自有一番“冰肌玉骨、冻蕊凝香”的丽趣。那花棚虽被厚重的棉帘遮挡,但掀开帘子的刹那,一股混合着泥土与花香的温润气息便扑面而来,与室外的严寒形成鲜明对比,仿佛踏入了暖春秘境。

如今,中国各地的花市更加热闹非凡。洛阳有牡丹市、菏泽有芍药集、成都有湿地花市、哈尔滨有冰雪花市,北京天坛公园东侧的园林市场一次次举办迎春花市……花市如一串璀璨的珍珠,串联起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当人们穿行在花市的花海中,赏心悦目的不仅是眼前的鲜花,更是美好如花的生活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



宋代的插花艺术促进了花市的繁荣。(图为李嵩所绘《花篮图》)

少舶来的花卉也在此港登岸,茉莉、水仙、郁金香等,皆由此时起“入籍”广州。大通港口沿途的沼泽湿地得天时地利,逐渐被开垦为鲜花种植地;今芳村花地古称花埭,河涌纵横、堤堰曲折,自隋代起当地居民便在此垦荒植卉,渐有花